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集刊AMI综合评价”入库集刊
复旦大学“学术期刊质量提升支持计划”资助立项

Journal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Volume 7, Issue 1 (2021)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

第十三辑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 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 第十三辑/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编.—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23.12

ISBN 978-7-5012-6700-2

I. ①中… II. ①复… III. ①中外关系—研究 IV. ①D822

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2023)第227592号

书 名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第十三辑 Zhongguo Zhoubian Waijiao Yanjiu · Di-shisan Ji
编 者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蒋少荣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陈可望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100010)
网 址	www.ishizhi.cn
电 话	010-65233645(市场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19½印张
字 数	350千字
版次印次	2023年12月第一版 2023年12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6700-2
定 价	8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集刊及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本集刊已被中国知网（CNKI）和万方数据（Wanfang Data）收录，其作者文章著作使用费与本集刊稿酬一次性给付。免费提供作者文章著作引用统计分析资料。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集刊声明，本集刊将做适当处理。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第十三辑（2021年第一辑）

由复旦大学“学术期刊质量提升支持计划”（复旦大学文科“双一流”建设项目）及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高峰学科”经费资助出版。

特此致谢！

The publication of
Journal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Volume 7, Issue 1 (2021)
was made possible through generous grants from
“Quality Improvement Program for Academic Journal” of Fudan
University (Fudan University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Project of
Liberal Arts) and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of Fudan University
(Fudan University Gaofeng Project of Political Science).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

Journal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主管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主办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

主编 杨 健
副主编 包霞琴 祁怀高 薛 松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左希迎	中国人民大学	石源华	复旦大学
卢光盛	云南大学	归泳涛	北京大学
包霞琴	复旦大学	关培凤	武汉大学
祁怀高	复旦大学	李皖南	暨南大学
杨 健	复旦大学	杨鲁慧	山东大学
吴心伯	复旦大学	吴寄南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日本] 青山瑠妙	日本早稻田大学 (Waseda University)		
周方银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赵卫华	复旦大学
赵可金	清华大学	赵青海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赵明昊	复旦大学		
钟飞腾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费 晟	中山大学	夏立平	同济大学
[马来西亚] 黄子坚 (Datuk Danny Wong Tze Ken)	马来西亚大学 (University of Malaya)		
郭 锐	吉林大学	薛 松	复旦大学
魏 玲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编辑部主任 温 尧
编辑 张泽宇 孙志强

编辑部联系方式

投稿邮箱: ccrnc@fudan.edu.cn

电 话: 86 21-6564 2939

传 真: 86 21-6564 2939

地 址: 上海市邯郸路220号复旦大学文科楼307室复旦大学中国与
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

邮 编: 200433

目录

CONTENTS

卷首语..... 祁怀高 / 1

新冠疫情与周边外交

中国和东盟的抗疫合作研究报告
.....“中国-东盟学术共同体”成员机构学者 / 9

新冠疫情以来印度对华外交新态势..... 杨路 / 46

周边国情研究

新环境下俄罗斯北极政策的再转型展望：目标、路径与挑战
..... 徐博 陈立赢 / 65

蒙古国转型三十年：人民党的政治改革与探索..... 祁治业 黄佟拉嘎 / 83

阿富汗“帝国陷阱”效应析论..... 杜哲元 / 114

周边国家对华外交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澳大利亚涉华认知中的变与不变
..... 孙西辉 刘雨桐 / 137

中国边海事务

中印边界西段对峙及其对双边关系的影响..... 关培凤 万佳 / 163

2020年中日钓鱼岛问题再起的特点与原因.....	包霞琴 宋 奥 /	181
南海外大陆架问题初析.....	杨 力 /	197
中国在南海共同开发中的动因和政策选项.....	祁怀高 /	217

周边国家数字经济研究

印度尼西亚佐科政府的数字经济发展探析.....	夏方波 /	233
中亚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及其与中国的合作.....	王海燕 /	257

会议综述

周边视域下的中国与东南亚校庆报告会综述.....	/	285
--------------------------	---	-----

附 录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简介.....	/	291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征稿启事.....	/	293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稿件体例及注释规范.....	/	295
审稿专家致谢.....	/	300

Contents

Preface of Volume *QI Huaigao* / 1

Covid-19 Pandemic and Neighboring Diplomacy

Research Report on ASEAN-China Cooperation in the Fight against Covid-19 / 9
 The New Trend of India's China Policy since the COVID-19 Pandemic
 *YANG Lu* / 46

Studies on Neighboring Countries

Re-Transformation of Russia's Arctic Policy in the New Environment:
 Goals, Paths and Challenges *XU Bo* and *CHEN Liying* / 65
 Mongolia's 30 Years Transition: The Political Reform and Evolution
 of Mongolian People's Party *QI Zhiye* and *HUANG Tonglaga* / 83
 On the Effect of "Empire Trap" in Afghanistan..... *DU Zheyuan* / 114

Neighboring Countries' Diplomacy towards China

Changes and Non-Changes in Australia's Perception Involving China
 since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SUN Xihui* and *LIU Yutong* / 137

China's Boundary and Ocean Affairs

The Confrontation in the Western Section of the Sino-Indian Border
 and Its Impact on Bilateral Relations *GUAN Peifeng* and *WAN Jia* / 163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of the Recurrence of the Diaoyu Islands
 Issue in 2020..... *BAO Xiaqin* and *SONG Ao* / 181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n the Issue of the Outer Continental Shelf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YANG Li</i> / 197
Joint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hina's Incentives and Policy Choices.....	<i>QI Huaigao</i> / 217

Studies on Digital Economy in Neighboring Countries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under Jokowi's Government	<i>XIA Fangbo</i> / 233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in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and Their Cooperation with China.....	<i>WANG Haiyan</i> / 257

Review on Symposiums

Review on Academic Seminar Heralding the 116th Anniversary of Fudan University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in the Perspective of Neighborhood.....	/ 285
---	-------

Appendix

Introduction on Center for China's Relations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of Fudan University (CCRNC-Fudan)	/ 291
Notice Invit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i>Journal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i>	/ 293
Standards of Articles and Annotations of the <i>Journal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i>	/ 295
Acknowledgements.....	/ 300

阿富汗“帝国陷阱”效应析论*

杜哲元

【内容提要】通过深入分析近代以来英国、苏联和美国武力进入阿富汗的历史，可以发现，相对于“帝国坟墓”，“帝国陷阱”这一概念能够更为准确客观地反映阿富汗在大国政治中最突出的效应。阿富汗“帝国陷阱”效应的形成过程往往要经过这三个阶段：“帝国”受到诱惑进入、“帝国”损失增加与“帝国”被迫撤离。这三个阶段又有五个方面的特点。中国在推进周边外交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不可能不面对和应对阿富汗这样一个特殊而重要的邻国。中国应在明确阿富汗对中国的实际价值与中国对阿富汗的实际需求的基础上，对于阿富汗重建以外交协调为主，有限的经济参与为辅，避免直接安全介入。

【关键词】阿富汗问题；大国政治；“帝国坟墓”；“帝国陷阱”；中国周边外交

【作者简介】杜哲元，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一、引言

在众多观察者看来，2021年8月美军从阿富汗的仓皇撤离意味着美国二十年阿富汗战争的失败，由此阿富汗是“帝国坟墓”的观点似乎再次得到验证。同时，这一观点也得以进一步传播，更多的观察者将它视为阿富汗大国政治的

* 作者感谢《中国周边外交研究》集刊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文中疏漏之责由作者自负。

历史铁律和宿命。然而，阿富汗真的是“帝国坟墓”吗？“帝国坟墓”足以客观准确地概括阿富汗在大国政治中的最突出的效应吗？一方面，作为国际政治中一个经常出现的带有一定特殊性和规律性的问题，它有着较大的学术研究意义；另一方面，阿富汗作为一个与中国接壤的邻国，它对中国西部周边安全局势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加强对该问题的研究亦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有必要对阿富汗的大国政治效应进行深入细致和认真扎实的学术剖析，而不是浮于表象或流于成见就妄下结论。本文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是：阿富汗在大国政治中最突出的效应是什么？它的形成过程和特点是什么？本文将主要通过历史分析法，在分析1838—1842年第一次英阿战争、1878—1881年第二次英阿战争、1979—1989年苏阿战争和2001—2021年美国阿富汗战争的基础上，回答本文的主要问题。

二、“帝国坟墓”还是“帝国陷阱”？

本文认为从学术的客观性和严谨性上讲，将阿富汗视为“帝国陷阱”要比“帝国坟墓”更为恰当。“帝国陷阱”这一概念能够更为准确客观地反映阿富汗在大国政治中最突出的效应，而“帝国坟墓”这一带有文学夸张性的概念虽然有着较强的话语传播力和穿透力，但并不能准确客观地反映阿富汗在大国政治中的实际效应，甚至会对现实政治产生误导性，误导国际社会对阿富汗的理解和认识，进而误导其他国家对阿富汗的政策，给阿富汗以及本国的利益带来不利影响。

（一）阿富汗不是“帝国坟墓”

在“帝国坟墓”这一概念中，所谓帝国是指世界一流强国，它们不仅国力强大，而且有着巨大的国际权势，对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有着重大影响，还奉行扩张性对外政策，积极谋求世界霸权；而“坟墓”一词则指死亡和毁灭，“帝国坟墓”可以理解为“帝国必死之地”。这死亡和毁灭有三层含义，通过对这三层含义的分析，可以发现将阿富汗称为“帝国坟墓”并不客观准确。

第一层含义是指“帝国”在阿富汗遭遇了极为惨重的损失，其损失之惨重犹如死亡和毁灭一样令“帝国”难以承受。英国、苏联和美国在武力进入阿富汗后确实损失惨重，比如英国在第一次英阿战争中就耗费了1500万英镑，损

失了大约4万条人命（军人和非军人的总数），^①在第二次英阿战争中，英国至少也损失数千名士兵；苏联在近十年的阿富汗战争中耗费了600亿卢布，损失了大约1.4万名士兵；^②美国在近二十年的阿富汗战争中则耗费了2万亿美元，损失了2400余名士兵。^③这些损失不可谓不惨重，但是它们的惨重性应该相对来看。一方面，相对而言阿富汗的损失更为惨重。苏联入侵阿富汗导致阿富汗约100万人伤亡，^④美国的阿富汗战争则导致阿富汗死亡人数超17.6万人，其中平民超过4.6万。^⑤可见阿富汗损失之惨重远远超过了这些武力进入阿富汗的“帝国”。从这一点来看，阿富汗被称为“阿富汗人的坟墓”或许更为客观准确，而“帝国坟墓”这一概念则多少有站在强权政治的角度为帝国扩张哀叹鸣屈之嫌，没有顾及阿富汗民众更为惨重的损失。另一方面，“帝国”为了保证其安全或扩大其权势，不可避免地会参与对外战争，尤其是那些体系性大战，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同样会遭遇惨重的损失，而这些损失要远远大于它们在阿富汗的损失。比如近代英国和俄国曾多次参与欧洲大陆的战争，从拿破仑战争到两次世界大战，英国和俄国无论是付出的生命，还是耗费的财富，都远远大于两次英阿战争和苏阿战争，但不曾有人将欧洲大陆称为英国和俄国的“帝国坟墓”。再比如美国在二战期间与日本在太平洋上进行旷日持久的激战，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损失的士兵人数远远高于阿富汗战争，但不曾有人将太平洋称为美国的“帝国坟墓”。因此，从这层含义来看，阿富汗还算不上“帝国坟墓”。

就第二层含义而言，它是指“帝国”在阿富汗遭遇了完全而彻底的失败，不仅是军事上的失败，更是指它未能在阿富汗实现其最基本的政治和战略目标。然而，这一点与历史事实并不相符。两次英阿战争中，英国不仅快速取得了第一阶段的军事胜利，而且在中间遭遇挫败后，又能很快地实施军事报复。从政治和战略目标的实现情况上看，第一次英阿战争结束后，多斯特·穆罕默

① 威廉·达尔林普尔：《王的归程——阿富汗战记（1839—1842）》，何畅炜、李旻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第529页。

② 刘纪未：《当代俄罗斯对阿富汗战争的评价浅析》，《西伯利亚研究》2016年第1期，第70页。

③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the End of the War in Afghanistan,” The White House, August 31, 2021, accessed September 13,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s=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the+End+of+the+War+in+Afghanistan>.

④ 钱雪梅：《阿富汗的大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第3页。

⑤ 《“9·11”恐袭事件21年后美国更乱了》，光明网，https://m.gmw.cn/2022-09/11/content_1303136426.htm，访问日期：2022年9月14日。

德统治下的阿富汗与英国建立起比较稳定的关系，阿富汗既没有加强与俄国的战略联系，更没有在印度民族大起义爆发时对英国趁火打劫，可以说英国在这次英阿战争中实现了其最基本的政治和战略目标。第二次英阿战争结束后，阿卜杜·拉赫曼统治下的阿富汗不仅接受了《甘达马克条约》中的大部分条款以及“杜兰线”，而且也没有加强与俄国的联系，没有使阿富汗成为俄国进军英属印度的通道，可以说英国在这次战争中也实现了其最基本的政治和战略目标。对于苏阿战争的结果，有相当多的俄罗斯人认为苏联取得了胜利，无论是军事上，还是政治和战略目标上，尤其是后一个方面，至少纳吉布拉克苏政权是在苏联解体之后才垮台的。正如俄罗斯总统普京所指出的：“不是俄罗斯（即苏联）输了阿富汗战争，俄罗斯（即苏联）总的来说很顺利地撤出了自己的部队——很大的数量，而且在喀布尔留下了一个政府，一个亲苏的政府。”^① 2009年2月，俄罗斯国家杜马在《关于阿富汗战争老兵的报告》中也提出：“苏联出兵阿富汗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避免了在我们国家南部出现新的战争，打击了这一地区猖獗的国际恐怖主义和毒品贸易。”^② 对于美国的阿富汗战争而言，近二十年的时间内，美军在阿富汗基本上没有遭遇军事上的严重失败，而2020年2月签订的美塔和平协议也满足了美国最基本的政治和战略目标——塔利班承诺防止任何团体或个人利用阿富汗国土危害美国及其盟国的安全，尽管这一点还存在着不确定性，但至少在美国撤离的一年内，恐怖主义势力确实并没有再通过阿富汗对美国发动袭击。由此来看，“帝国”并没有在阿富汗遭遇完全而彻底的失败，它们或多或少地还是实现了自己的基本目标。从这层含义上看，将阿富汗称为“帝国坟墓”过于夸张。

就第三层含义而言，是指“帝国”由于武力进入阿富汗而导致其国家走向不可逆转的衰落，其世界一流强国的实力和地位因为阿富汗战争而终结。但这一点同样与历史事实不符。英国虽然在两次阿富汗战争中损失较大，但这并未冲击英国在国际体系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实际上从19世纪40年代直到19世纪末，正是英国如日中天的时候，而英国真正走向衰落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认为1838—1842年和1878—1881年的两次英阿战争导致了一百年后或一个甲子之后英国的衰落和帝国的解体，这种因果逻辑联系是无法建立起来的。而且

^① 《普京文集（2002—2008）》编委会：《普京文集（2002—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470页。

^② 刘纪未：《当代俄罗斯对阿富汗战争的评价浅析》，《西伯利亚研究》2016年第1期，第71页。

在地区权力结构上，两次英阿战争也没有导致英国在亚洲权势的衰落。第一次英阿战争结束后不久，英国就征服了信德和旁遮普这两块富庶而重要的区域，几乎一统印度次大陆。第二次英阿战争结束后不久，英国就发动了第三次英缅战争，征服了缅甸全境，它在亚洲的权势可谓是臻于极盛。苏联在1989年从阿富汗撤军，两年后苏联解体，但这并不能证明是阿富汗战争导致了苏联的衰落和解体。苏联的衰落和解体是诸多内外因素共同作用所导致的，近十年的阿富汗战争只是导致苏联衰落和解体诸多外因中的一个，而且也只是是一个次要因素，它在经济上对苏联解体的影响甚至不及20世纪80年代石油价格的暴跌，它在政治上对苏联解体的影响甚至不及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虽然近年来“美国衰落论”较为盛行，但这一观点在学术界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论，不少学者并不认为美国真正在走向衰落，^①而即便美国真的走向衰落，近二十年的阿富汗战争也难言是其主要原因。这是因为，一方面，美国的衰落更多的是相对衰落，主要表现在它的经济增速不及体系内的第二大经济体，阿富汗战争显然不是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而且美国与其他大的经济体相比，它的经济状况并不逊色。^②另一方面，美国国内政治经济政策上的问题是导致美国衰落的主要原因，而阿富汗战争并不是美国国内政治经济政策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因此，将“帝国”的衰落归因于它的阿富汗战争是偏颇和片面的。世界一流强国在扩张权势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各种各样的挫败，在阿富汗一时一地的挫败并不足以扭转它的国运，使之由盛而衰。

综合上述分析来看，阿富汗大国政治中最突出的效应不是“帝国坟墓”，将阿富汗称为“帝国坟墓”并不够客观准确。

（二）作为“帝国陷阱”的阿富汗

阿富汗在大国政治中更像“帝国陷阱”。这是因为，首先对于大国而言，它具有一定的诱惑性，这主要体现在它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上。阿富汗有“亚洲之心”^③和“亚洲十字路口”^④之称，位于中亚、南亚、西亚和东亚的联结部

① 王缉思：《美国内政外交演变的表现与动因——王缉思教授专访》，《当代美国评论》2022年第1期，第2—4页。

② 王缉思：《美国内政外交演变的表现与动因——王缉思教授专访》，《当代美国评论》2022年第1期，第2—3页。

③ 钱雪梅：《阿富汗的大国政治》，第3页。

④ A. 利亚霍夫斯基：《阿富汗战争的悲剧》，刘宪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1页。

上，通过阿富汗既可以对这四大区域发挥影响，又可以兼收这四大区域相互联系而产生的利益。同时，它还位于亚洲腹地和印度洋的结合部上，近代以来，陆权强国可以以它为跳板进入“世界海权的中心”印度洋，^①海权强国则可以通过它逼近亚欧大陆的心脏腹地。阿富汗的地缘枢纽地位对于那些意欲问鼎世界霸权的“帝国”而言，既有可能是其安全形势中最薄弱的环节，也有可能是其权势的倍增器。无论是为了进一步巩固自身的安全，还是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势，阿富汗往往会令那些“帝国”垂涎欲滴，夜不能寐，从而谋求控制阿富汗，使其服务于自己的安全和战略利益。然而，阿富汗的这种地缘枢纽性更多的只是理论和地图上的，若要将其变为现实则困难重重。

其次，“陷阱”一词在一定程度上能体现出“帝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战略决策失误。“陷阱”是客观存在的，但“陷阱”是否会损害“帝国”的利益，则取决于“帝国”的战略决策。这些“帝国”未能辨识出阿富汗作为“陷阱”的特性和效应，对于武力进入阿富汗的潜在成本和风险缺乏全面而深入的认识，所以它们才会主观上选择进入阿富汗“陷阱”之中。英国发动两次英阿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对阿富汗的两位君主（多斯特·穆罕默德和谢尔·阿里）以及阿富汗的内部政治形势和传统缺乏了解，轻易地认为他们真的要“背英联俄”。苏联发动侵阿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它对阿富汗领导人哈菲佐拉·阿明的猜疑加剧导致的，但这种猜疑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美国坚持发动阿富汗战争，推翻塔利班政权，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它对普什图人“庇护客人”^②的文化传统缺乏了解和尊重，并以“绝对安全”的迷思去看待和应对恐怖主义问题。“帝国”之所以在阿富汗问题上频频出现战略决策失误，其一，是因为它们在阿富汗问题上情报和知识相对匮乏；其二，是因为帝国的傲慢自负；其三，是因为它们夸大和误判了潜在威胁的严重性。在错误的战略认知和判断的误导下，“帝国”选择了进入阿富汗“陷阱”。

再次，对于武力进入阿富汗的“帝国”而言，它总会遭受到各种形式和程度不一的损失。一方面，不同于“坟墓”所意指的那种致命性的损失，“陷阱”中损失的严重性相对较小，这种损失既不足以严重削弱“帝国”的国力，又不足以动摇它们在全球和地区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尽管损失相对较小，但这种损失仍是超出了“帝国”的心理预期，使其认为在阿富汗的军事行

^① 张文木：《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第217页。

^② 钱雪梅：《普什图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第99—101页。

动损失大于收益，从而不愿意继续承受这种损失。

最后，“帝国”并不能很轻易地就从阿富汗“陷阱”中跳出来，在时间上往往拖延较久。在近代以来的四次“帝国”武力进入阿富汗的历史中，第二次英阿战争的时间持续最短，从1878年11月持续到1881年4月，近两年半的时间。而与同时期的英国发动的其他对外战争相比，比如祖鲁战争持续了不到半年时间，第一次布尔战争则持续了不到三个月，第二次英阿战争的持续时间则长得多。第一次英阿战争从1838年10月持续到1842年10月，更长达四年之久。苏阿战争从1979年12月持续到了1989年2月，近十年之久，其时间远超1956年和1968年苏联对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行动。美国的阿富汗战争在这四者中持续时间最长，从2001年10月持续到2021年8月，近二十年之久，可谓是美国历史上最漫长的对外战争。^①而更能说明这种拖延性的在于，这些“帝国”从准备撤出阿富汗，到它们真正撤离阿富汗也耗时较长。第一次英阿战争中，反对此次战争的保守党于1841年9月上台，英国即决意从阿富汗撤军，但直到一年后，英国才真正实现从阿富汗撤军；第二次英阿战争中，反对此次战争的自由党于1880年4月上台，英国即决意从阿富汗撤军，但直到一年后，英国才真正实现从阿富汗撤军；在苏阿战争中，1985年10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就决定尽快从阿富汗撤军，^②但直到三年多后，苏联才真正实现从阿富汗撤军，有学者将这个过程称之为“漫长的告别”^③；在美国的阿富汗战争中，奥巴马总统于2011年6月正式提出从阿富汗撤军的时间表，但直到十年多之后，美国才真正得以从阿富汗撤军。由此可见，虽然不像“坟墓”那样走不出来，但是“帝国”几乎不可能从阿富汗“陷阱”中轻松顺利地一跃而出，这个出来的过程耗费了“帝国”大量的时间与资源。

从这四点分析来看，本文认为将近代以来阿富汗在大国政治中最突出的效应概括为“帝国陷阱”更为客观准确。

①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the End of the War in Afghanistan,” The White House, August 31, 2021, accessed September 13,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s=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the+End+of+the+War+in+Afghanistan>.

② A. 利亚霍夫斯基：《阿富汗战争的悲剧》，第274—275页。

③ Artemy M. Kalinovsky, *A Long Goodbye: The Soviet Withdrawal from Afghanistan*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三、阿富汗“帝国陷阱”的形成与特点

(一) 阿富汗“帝国陷阱”效应形成的三个阶段

阿富汗“帝国陷阱”效应的形成过程往往要经过这三个阶段：(1)“帝国”受到诱惑进入。阿富汗重要而特殊的安全价值使“帝国”试图加大对它的影响和控制，这为“帝国”武力进入阿富汗“陷阱”提供了基础。阿富汗内政中的某些方面外溢到它的外交方面，而它的对外战略决策出现重大失误，将使它对于“帝国”的安全价值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大幅提升，同时，也使它对于“帝国”的威望价值大幅提升，这将直接导致“帝国”决定武力进入阿富汗“陷阱”。(2)“帝国”损失增加。“帝国”武力进入阿富汗“陷阱”后，将出现阿富汗对于“帝国”经济价值与安全价值的严重失衡的现象，“帝国”在阿富汗经济耗费巨大，经济上得不偿失。随着“帝国”在阿富汗军事行动的长期化，阿富汗对于“帝国”的安全价值、威望价值与经济价值均会急剧下降。“帝国”不仅在经济上损失严重，在安全和威望上也损失严重，由此“帝国”开始准备离开阿富汗“陷阱”。(3)“帝国”被迫撤离。“帝国”通过政治方式与阿富汗某个强大的政治人物或组织达成协议，在满足部分或基本的安全和威望诉求后，真正撤离阿富汗“陷阱”。

(二) 阿富汗“帝国陷阱”效应的五个特点

这三个阶段又有五个特点。

第一，“帝国”被诱惑进入和陷入阿富汗“陷阱”的因素主要在安全和威望这两个方面，“帝国”基本上都是为了维护和巩固自身安全与国际威望而选择武力进入阿富汗。但它们对自身安全和国际威望都存在着一一定的迷思，即过度夸大因阿富汗而产生的威胁的严重性，并过度夸大国际威望受损而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英国发动两次英阿战争的直接原因是阿富汗国王接待了俄国使者，1838年多斯特·穆罕默德在喀布尔接待了俄国使者维特克维奇上尉，1878年谢尔·阿里又在喀布尔接待了斯托列托夫少将率领的俄国使团，并与之签订了同盟条约。阿富汗这两次外交行动刺激了英国在帝国安全上最敏感的神经。英国认为，英属印度的安全决定了英帝国的安全和繁荣，英属印度的陆上安全则取决于它西北边境的安全，而阿富汗对于英属印度西北边境的安全至关重要。拿

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与俄国开始相互视彼此为最大的威胁，英国时刻都担心俄国会通过阿富汗威胁和破坏英属印度的安全。为了使阿富汗能够远离俄国而服从于英国的安全和战略利益，以防止俄国通过阿富汗威胁和破坏英属印度的安全，英国两次决意出兵阿富汗。但事实上，俄国在这两个时期根本无力通过阿富汗威胁和破坏英属印度的安全。1838年俄国不仅尚未平定哈萨克草原，而且与阿富汗之间还远隔着河中三汗国。1878年俄国的属地虽然开始与阿富汗接壤，但它刚刚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结束鏖战，惨胜使它师老财竭，不可能再分兵与另一个世界一流强国作战。俄国对阿富汗的外交行动更多的是一种战略佯动，以牵制和分散英国的精力与资源。但英国却在阿富汗问题上明显夸大了俄国威胁的严重性，而这种严重性只是英国主观臆想出来的。

此外，在这个过程中，维护所谓英国的国际威望也成为刺激英国决定动武的一项重要因素。多斯特·穆罕默德盛情接待了维特克维奇而驱逐了英国使者亚历山大·伯恩斯，这被英国视为奇耻大辱。谢尔·阿里以盛大的仪式迎接俄国使团而拒绝英国派遣使团进入阿富汗，这也被英国视为是奇耻大辱。1878年英印总督李顿就认为俄国使团被阿富汗接受，英国使团也必须要被接受，否则将会使英国的荣誉受损，并传达出英国软弱的信号。^①而且英国还过分夸大了在阿富汗威望受损所产生的连锁反应，认为英国在印度次大陆和亚洲的权势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它的威望之上。如果英国在阿富汗的威望不能重新树立起来，那么它在亚洲的威望和权势将趋于崩塌。这一点显然与事实不符，历史事实表明，一国的威望不是由该国在某个特定时刻采取的特定行动的成败来决定的。相反，它是一个国家的品质和行动、功业和败绩、历史记忆和意愿的综合反映。一些国家由于拥有巨大的权力，且它的权力地位得到了其他强国的承认，那么它们即使遭受了失败或放弃了显赫的地位，也不会蒙受威望上的损失。一国在特定条件下的威望变化，就像该威望所反映出的权力一样，必须在一国总体权力和威望的大背景中才能看得清楚。^②

1979年苏联决定出兵阿富汗主要也是因为安全方面的因素，即担心阿富汗会倒向美国，从而便于美国威胁苏联南部边疆的安全。比如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和国防部长乌斯基诺夫就认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建立包括苏联南部加

① Alexander Morrison, "Beyond the 'Great Game': 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Second Anglo-Afghan War," *Modern Asian Studies* 51, no.3 (2017): 713.

②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Sixth edi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5), p.97.

盟共和国在内的“新奥斯曼大帝国”方面又加大了力度，如果苏联失去南部地区的可靠防空体系，一旦美国在阿富汗部署导弹，受到威胁的将是苏联的一些极其重要的目标。^①但后来事实证明，苏联关于阿明有意倒向美国的判断是错误的，苏联误判阿富汗的形势，而夸大了美国利用阿富汗威胁苏联安全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另外，苏联决定出兵阿富汗与苏联决策层认为它在阿富汗的威望受损有较大的关系。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人民派”总书记塔拉基较为亲苏，在被阿明刺杀前，他曾到访苏联，与勃列日涅夫等苏联主要领导人会谈，在会谈中，勃列日涅夫不仅许诺给予塔拉基支持和援助，^②而且保证在塔拉基回国之时，阿明将不复存在。^③在塔拉基返回阿富汗后，勃列日涅夫还亲自来函试图调解二人的矛盾。但随后不久，阿明就刺杀了塔拉基，成为阿富汗的最高领导人。阿明的行为使苏联决策层倍感愤怒和羞辱，他们认为阿明的行为严重损害了苏联的威望，以至于勃列日涅夫提出：阿明是个什么样的渣滓啊！用枕头闷死了和自己一道参加革命的同志！是谁领导了阿富汗革命？别的国家会怎么说呢？难道还能相信勃列日涅夫的话吗？如果他许诺的支持和保护只停留在口头上……^④勃列日涅夫的这一表态促使苏联最终决定出兵阿富汗。很显然，勃列日涅夫出现了误判，苏联出兵阿富汗不但没能维护苏联在阿富汗的威望，反而在全球范围内严重损害了苏联的威望。

2001年美国决定出兵阿富汗，同样也主要是因为安全方面的因素。美国认为以阿富汗为大本营的“基地”组织严重破坏和威胁了美国的安全，美国必须出兵阿富汗以对其犁庭扫穴。“9·11”事件爆发后，美国拒绝塔利班的建议，选择推翻塔利班，则在一定程度上是威望因素所导致的。“基地”组织的恐怖袭击使美国威望严重受损，为了维护其威望，美国不仅不接受塔利班有条件地交出本·拉登的提议，而且对与“基地”组织有密切关系的塔利班提出其难以实现的要求，^⑤而这又引发了塔利班与美国的全面对立。但事实上美国过分夸大了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它把国家安全战略重心放在反恐方面，正如傅立民所言，所谓的全球反恐战争是一个错误的命题。恐怖主义是一种战争的工

① A. 利亚霍夫斯基：《阿富汗战争的悲剧》，第104页。

② A. 利亚霍夫斯基：《阿富汗战争的悲剧》，第111页。

③ A. 利亚霍夫斯基：《阿富汗战争的悲剧》，第82页。

④ A. 利亚霍夫斯基：《阿富汗战争的悲剧》，第111页。

⑤ 钱雪梅：《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的关系》，《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20（上）》，第146页。

种手段，一种暴力的手段，你确实无法有效地反对一种手段。^①而随着塔利班逐渐恢复起来，美国又继续夸大塔利班的威胁，为了迫使塔利班屈服，它不仅反复增兵阿富汗，还要在阿富汗推行“国家建设”。^②如果美国能破除自己的威望迷思，以真诚对话的姿态对待塔利班，或许美国的阿富汗战争将会是另一种情形。

第二，“帝国”武力进入阿富汗“陷阱”，与阿富汗自身的内外政策有较大的关系。阿富汗内政中的某些方面外溢到了它的外交上，以及它对外战略决策上的失误，是招致“帝国”入侵的一个重要原因。阿富汗虽然相对弱小，但它的对外战略却不乏冒险性。

英国发动第一次英阿战争与阿富汗内部的王位之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多斯特·穆罕默德取代了原来杜兰尼王朝的舒贾·沙阿，成为阿富汗国王，迫使后者流亡英属印度。但后者却深得英印政府的欢心，因此英印政府对多斯特·穆罕默德相当猜疑和排斥，准备在时机成熟的条件下帮助舒贾·沙阿复位。尽管多斯特·穆罕默德试图争取英印政府的信任，但效果不佳。而这时俄国使者恰好到达喀布尔，或许是为了向英国施压，或许是为了增加自己与英印政府打交道时的分量，多斯特·穆罕默德采取了“联俄制英”的战略，结好俄国使者，驱逐英国使者。这是阿富汗对外战略中的严重失误。英国发动第二次英阿战争也与阿富汗的王位继承问题有着密切关系。多斯特·穆罕默德去世后，他的诸多王子为争夺王位而进行战争，谢尔·阿里曾多次向英印政府寻求支持和援助，英印政府并没有予以积极回应，这使得谢尔·阿里对英国大为不满。在其王位巩固之后，他又寻求英国承认他指定的继承人的合法性，并试图使英国对他将来能顺利继承王位做出保证。但英国拒绝了谢尔·阿里的要求，谢尔·阿里对英国的不满进一步加深，双方的关系进一步趋于冷淡。而俄国此时又向阿富汗派遣使团，谢尔·阿里竟同样采取“联俄制英”的战略，与俄国签订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条约，^③并且几乎断绝了与英国的外交往来。多斯特·穆罕默德父子二人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两次采取了阿富汗版的“以夷制夷”战略，但他们的这种战略明显是错误的。他们既不清楚俄国的真实意图和实力，

① 《傅立民：肇始于阿富汗战争的美国“全球反恐”，失败了》，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397571，访问日期：2022年9月15日。

② 赵明昊：《美国在阿富汗的“国家建设”缘何失败》，《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3期，第102页。

③ M. A. 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二卷，新疆大学外语系译，商务印书馆，1983，第535—537页。

也没能正确评估阿富汗在英俄两强对外战略中的地位。阿富汗对于俄国的重要性不仅远远低于它对于英国的重要性，而且远远低于英俄关系稳定对于俄国的重要性，俄国为了阿富汗而愿意接受的成本和风险远远低于英国，俄国不可能为了阿富汗而与英国兵戎相见。这两次战争爆发后，俄国都袖手旁观，充分表明阿富汗这两次对外战略决策的失误。这两次失误激起了英国的“俄国威胁论”，使英国开始夸大英属印度所面临的威胁的严重性，从而刺激它过度反应，选择对阿富汗发动军事入侵。

20世纪50年代阿富汗在向苏联寻求军事援助的同时，也开始派人前往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接受军事训练，到了60年代初期，数百名留学社会主义国家、接受军事训练的留学生开始返回阿富汗。^①这些留学生同时也把马克思主义带到了阿富汗。1965年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成立。这个政党与苏联有着密切关系，也使得阿富汗的命运与苏联深度绑定在一起。经过多次斗争，人民民主党中“人民派”的领导人阿明在1979年10月杀死该派前总书记塔拉基，独揽大权。但塔拉基深受苏联信任，而阿明却并不被苏联所信任，苏联不认为阿明能够平定其国内的动荡局势——1978年人民民主党上台后，推行的激进改革政策使阿富汗国内秩序严重恶化，宗教极端主义势力不断坐大。而且更为关键的是，苏联对阿明的对苏忠诚度备感怀疑，阿明一上台就释放与美国接近的信号，并且与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阿道夫·杜布斯往来密切。^②同时，他还试图削弱苏联对阿富汗的影响，使阿富汗像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那样成为强硬的社会主义国家，奉行不结盟的国策。^③在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苏共中央国际部长波诺马廖夫共同签署的绝密文件中，苏联就认为：在同苏联的关系中，阿明的行为越来越暴露出虚伪和两面性。阿明和他的心腹们口口声声说要在各个领域同苏联发展合作关系，实际上他们却在怂恿有悖于这种合作的行为。^④因此，苏联格外担心阿明会加入美国的阵营中，甚至克格勃还认为阿明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背景。^⑤于是在1979年12月，苏联决定出兵阿富汗，用亲苏的卡尔迈勒取代阿明。

塔利班错误的内外政策也是导致美国出兵的重要原因。就其国内政策而

① 塔米姆·安萨利：《无规则游戏：阿富汗屡被中断的历史》，钟鹰翔译，朱永彪审校，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第184页。

② 钱雪梅：《阿富汗的大国政治》，第24页。

③ 塔米姆·安萨利：《无规则游戏：阿富汗屡被中断的历史》，第201页。

④ A. 利亚霍夫斯基：《阿富汗战争的悲剧》，第95页。

⑤ A. 利亚霍夫斯基：《阿富汗战争的悲剧》，第100—101页。

言，塔利班上台后在国内推行强硬的宗教极端政策，既使得美国国内相当一部分政治势力对其深恶痛绝，也使美国出兵阿富汗得到了部分情感和道义上的动力与合法性。就其对外政策而言，塔利班收容“基地”组织，并且纵容它对外实施恐怖袭击，这显然不是现代国家正常合理的对外政策。而在基地组织发动“9·11”恐怖袭击之后，它又囿于保护客人的普什图法则不愿直接交出祸首本·拉登。^①由此它被美国视为支持恐怖主义的政权，从而遭到军事打击。很显然，塔利班已经成为阿富汗的执政力量，但它并没有超越原来所在位置的视角，仍旧从一个族群和政治组织的相对狭隘的视角，而不是从整个国家的视角做对外战略决策。

第三，在武力进入阿富汗“陷阱”之前，“帝国”决策层内部对该“陷阱”的风险和危险都有一定的先见之明，但却仍然无法阻止它们决意进入，而且这些先见之明在后来也难以改变“帝国”在阿富汗遭受严重损失的命运。

在第一次英阿战争爆发之前，虽然英国与阿富汗交往有限，对其缺乏了解，但对于是否要远征阿富汗，英国国内决策层很多人都认为占领阿富汗不但代价高昂，会削弱英属印度在其他方向边境的防卫，还会把波斯进一步推向俄国。惠灵顿公爵就是反对者之一，他警告说，依靠武力获得的成功，总免不了政治上的窘境。^②第一次英阿战争结束后，英国已经对阿富汗“帝国陷阱”的特性和效应有了非常多的认识，甚至还形成了一个反对对阿富汗采取进攻性政策的“精明无为”派。^③该派认为：阿富汗人民勇敢、胆大且酷爱独立，阿富汗又非常适合游击战，如果英国因为其首领的错误而进攻阿富汗以实施惩罚，或是为了修改英属印度的西北边界而进攻阿富汗，那么阿富汗人民肯定会拼尽全力反抗英国；^④无论英国是以朋友还是敌人的身份来到阿富汗，其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英国人出现在阿富汗只会让阿富汗人民对他们感到恐惧和憎恶，这在宗教势力和部落首领的煽动下将进一步恶化。^⑤而且阿富汗的自然条

① 钱雪梅：《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的关系》，第146页。

② 彼得·霍普柯克：《大博弈：英俄帝国中亚争霸战》，张望、岸青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第219页。

③ Evgeny Sergeev, *The Great Game 1856-1907: Russo-British Relations in Central and East Asia*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13), p.125; Peter Hopkirk, *The Great Game: The Struggle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 (New York: Kodansha America, Inc., 1992), p.318.

④ Sir Richard Temple, *Lord Lawrence*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05), p.186.

⑤ Gerald Morgan, *Anglo-Russian Rivalry in Central Asia: 1810-1895* (Oxon: Frank Cass, 1981), p.227.

件恶劣，食物匮乏，它国内生产的食物尚不足以满足其民众的需要。如果再有大批外国军队驻扎在阿富汗的话，阿富汗境内的食物需求量将急剧上升，这势必会引起阿富汗境内食物价格的上涨，而这又将加剧阿富汗民众对外国驻军的憎恨；^① 由于阿富汗主要是山地地形，道路崎岖艰险，从遥远的阿富汗境外转运食物成本太大，耗费甚巨，并不是一个实际可行的方案，因此即便不考虑阿富汗的民族特性，阿富汗自身的实际条件也不适于大规模的外国军队驻扎。^② 尽管该派不仅在英印政府，而且在伦敦最高决策层都有较大的影响，但他们的观点和影响既没能阻止英国发动第二次英阿战争，也没能帮助英国避免或减轻在阿富汗遭受的严重损失。

在苏联决策层讨论是否要出兵阿富汗时，其内部出现了诸多反对意见，安德罗波夫指出：如果出兵，苏联这些年克服困难进行的诸如裁军等许多事情就会半途而废，所有不结盟国家将反对苏联。苏联会赢得什么？阿富汗和它的现政权，还有落后的经济和国际事务中微不足道的分量？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契尔年科则提出：如果我们出兵并且攻击了阿富汗人民，我们必定会被指责侵略，那可罪责难逃。^③ 苏军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也曾劝告苏联决策层：对阿富汗不要寄希望于武力手段，阿富汗人的传统是对于自己领土上的外来人从来不予容忍，苏军可能会在阿富汗陷入军事行动而无法自拔，同时，苏联将遭到所有东方穆斯林的反对，会在全世界一败涂地。^④ 此外，苏军中的一些高层将领在讨论的最后仍在反对出兵，他们劝告苏联决策层，苏军的介入会激化作战行动，使之扩散，使叛乱活动进一步升级，而缺乏对阿富汗传统和风俗的了解，特别是对伊斯兰教以及民族和种族之间相互关系的无知，将会置苏联于非常艰难的境地。^⑤ 但这些反对之声并没能阻止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决策层决定出兵，这些富有前瞻性的告诫也没能帮助苏联避免或减轻在阿富汗遭受的严重损失。

“9·11”事件爆发后，在小布什政府决策出兵阿富汗的过程中，决策团队中的要员基本上都对阿富汗的危险性有较多的认识和共识。甚至其中的鹰派人物如副总统迪克·切尼和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都深知相关历史教

① Gerald Morgan, *Anglo-Russian Rivalry in Central Asia: 1810-1895*, pp.226-227.

② Gerald Morgan, *Anglo-Russian Rivalry in Central Asia: 1810-1895*, p.227.

③ A. 利亚霍夫斯基：《阿富汗战争的悲剧》，第67—68页。

④ A. 利亚霍夫斯基：《阿富汗战争的悲剧》，第104—105页。

⑤ A. 利亚霍夫斯基：《阿富汗战争的悲剧》，第113页。

训。切尼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当我们开始筹划在阿富汗展开军事行动时，很多人担心我们要承担难以完成的任务。苏联的遭遇已经证明阿富汗完全是帝国的坟墓。任何希望在此取胜的国家，都必须认真考虑阿富汗崎岖不平的险恶地形，还必须意识到阿富汗人是世界上最顽强、最凶狠的战士。”^① 拉姆斯菲尔德则在其回忆录中直接把美国出兵阿富汗这部分的标题命名为“进入帝国坟场”，^② 他在书中写道：“2001年年底，美国打击塔利班政权及其基地组织‘客人’的军事行动即将展开，我仔细考虑了苏联失败的教训。企图占领这个国家的外国部队有很多，苏联红军只不过是距今最近的一支，阿富汗人强韧、好战，加上深入内陆、多山的地形令最无畏的入侵者也不得不铩羽而归。”^③ 而且时任美国中央战区司令的汤米·弗兰克上将也曾当面对小布什陈述出兵阿富汗的风险和危险，小布什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会很不容易。这个国家的一切都充斥着麻烦：偏远、地形崎岖，又很原始。所有阿富汗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总会团结起来反对外国人。19世纪，他们赶走了英国人，20世纪，他们又赶走了苏联人，即使是亚历山大大帝也不能征服阿富汗。阿富汗因为这些历史赢得了个不祥的绰号：帝国的坟墓。”^④ 然而这些建立在前人教训基础上的先见之明，同样既没能阻止小布什政府出兵阿富汗，也没能帮助美国避免或减轻在阿富汗遭受的严重损失。

对于“帝国”而言，它们明知阿富汗可能会产生“陷阱”的特性和效应，但仍一批又一批地进入该“陷阱”之中，历史的教训是充分而醒目的，然而一旦轮到本国直面该“陷阱”，这些教训似乎又变得单薄而模糊。

第四，从“帝国”与阿富汗的互动角度来看，“帝国”在阿富汗受损主要是由阿富汗安全价值与经济价值的严重失衡导致的。对于“帝国”而言，阿富汗巨大的安全价值吸引着它们武力进入，但阿富汗较小的经济价值使“帝国”在阿富汗的行动耗费巨大、得不偿失。随着这种失衡的不断加剧，阿富汗对于“帝国”的安全价值和威望价值也都将严重下降，直到成为“帝国”的负担，这将导致“帝国”准备撤离阿富汗。

① 迪克·切尼：《我的岁月：切尼回忆录》，任东来、胡晓进译，译林出版社，2015，第279页。

②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已知与未知：美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回忆录》，魏骅译，华文出版社，2013，第3页。

③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已知与未知：美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回忆录》，第264页。

④ 乔治·沃克·布什：《抉择时刻：乔治·沃克·布什自传》，东西网译，中信出版社，2011，第182—183页。

就阿富汗的经济价值而言，众所周知，首先，阿富汗是个山地高原之国，境内荒漠广布，可耕地极为稀少。其次，从真正勘探到的能源资源储量来看，阿富汗并不具备丰富的能源资源，^①而且阿矿产资源开采和运输难度极大。最后，阿富汗农业薄弱，也几乎没有工业基础，民众普遍较为贫困，消费能力和市场潜力都相当有限。这些决定了阿富汗的经济价值非常小。尽管“帝国”武力进入阿富汗并不是为了获取阿富汗的经济价值，但它进入阿富汗之后却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它不仅难以获得大量的财富和资源，而且难以获取必要的经济回报，用来弥补它的开支以维持它对阿富汗的占领，甚至连驻军的食物供给都是问题。再加上反对外来入侵者的起义此起彼伏，阿富汗社会的动荡不安，想要在阿富汗建立起稳定的经济秩序更是难上加难。这使得“帝国”在阿富汗的经济耗费似乎是无止境的，完全看不到有停止或获得回报的那一天。于是“帝国”开始感到它在阿富汗遭受了损失，意识到自身进入“陷阱”之中。

“帝国”武力进入阿富汗主要是因为阿富汗的安全价值和威望价值。然而，一方面，安全价值和威望价值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们与经济价值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阿富汗对于“帝国”经济价值不断地负增长，势必会使它的安全价值和威望价值也严重下降。另一方面，“帝国”武力进入阿富汗之后，会发现它即便占领了阿富汗，也不能实现阿富汗对它的安全价值。“帝国”在阿富汗的安全威胁已不只是原来的那些，它的安全威胁还包括遍布全国的阿富汗起义者和阿富汗民众，甚至阿富汗起义者已经是“帝国”在阿富汗的直接和首要安全威胁，这样“帝国”非但无法实现阿富汗的安全价值以巩固自身的安全形势，反而使阿富汗的安全价值急剧下降，直到成为沉重的安全负担。在威望价值方面同样也是如此，“帝国”不但不能通过阿富汗维护和扩大本国的威望，反而会成为国际社会嘲笑和谴责的对象，从而为“帝国”带来沉重的威望负担。当阿富汗对于“帝国”的安全价值、威望价值和经济价值成为“帝国”的安全负担、威望负担和经济负担，而且这些负担日趋加重时，阿富汗“帝国陷阱”效应就开始出现，并不断放大，“帝国”将考虑和准备撤离阿富汗“陷阱”。

第五，“帝国”能否做到及时止损是其减轻阿富汗“陷阱”所带来损失的关键，能否从阿富汗内部找到值得信任并能够控制阿富汗局势的人物或组织，是影响“帝国”能否及时止损的一项重要原因。而能否做到这一点，除了时机

^① 相关研究可参见杨恕、韩笑：《阿富汗矿产资源开发：历史、现状及前景》，《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13—21页；杨晓刚、段俊梅、李尚林等：《阿富汗主要矿产资源及其矿业投资环境》，《世界地理研究》2014年第2期，第51—58页。

和运气因素，还取决于“帝国”的战略定力和战略胸怀。

从近代以来英国、苏联和美国武力进入阿富汗的历史来看，第二次英阿战争持续的时间最短，第一次英阿战争次之，苏阿战争再次之，美国的阿富汗战争则持续的时间最长。相对于后两者，英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及时止损，较早地从阿富汗撤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实现了它在阿富汗的基本战略诉求和目标。多斯特·穆罕默德和阿卜杜·拉赫曼这两位阿富汗国王在这个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多斯特·穆罕默德在第一次英阿战争中被英国流放到英属印度，1841年阿富汗反英起义爆发后，英国扶持的舒贾·沙阿在起义中遇刺身亡，英国于是决定将多斯特·穆罕默德放回阿富汗，不干涉其统一阿富汗的行动，甚至还为其提供一定的外部保障。而多斯特·穆罕默德则从两个方面回报英国——不与俄国发生战略关系，不袭扰英属印度的边界。而这正是战前英国对阿富汗的基本战略诉求和目标。1880年年初，正在阿富汗反英起义中焦头烂额的英国，突然收到阿卜杜·拉赫曼（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孙子，谢尔·阿里的侄子）正从俄属中亚返回阿富汗的消息，经过与他的数次沟通，英国决定支持他成为阿富汗国王，^①英国不仅放弃了以前肢解阿富汗的计划，甚至还调遣军队协助他平定阿富汗的地方势力。而阿卜杜·拉赫曼则以接受《甘达马克条约》中的大部分条款作为回报，而这些条款正是战前英国对阿富汗的基本战略诉求和目标。假如英国对流放中的多斯特·穆罕默德疑心重重，用固化的二元对立思维去看待他，想当然地认为他会对英国记仇和复仇。那么多斯特·穆罕默德恐怕不会重掌阿富汗大权，而英国恐怕既难以在较短的时期内从阿富汗“陷阱”中出来，也很难实现它的基本战略诉求和目标。同样，阿卜杜·拉赫曼长期生活在俄属中亚，返回阿富汗时还身着俄式军大衣，英国如果用固化的二元对立思维去看待他，很有可能会把他视为俄国的代理人而予以排斥，但英国却给予他相当大的信任和支持。英国这两次武力进入阿富汗“陷阱”基本上实现了及时止损，并且基本上实现了战前的战略诉求和目标。

与英国的例子相反，苏联和美国并未能实现及时止损。苏联固化地用对苏态度作为其选择在阿富汗扶持对象的标准，根据这个标准，它选择了亲苏的卡尔迈勒作为阿富汗领导人，但卡尔迈勒的治党治国能力严重不足。在他的领导下，人民民主党缺乏真正的团结统一，党和政府部门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工作软

^① 珀西·塞克斯：《阿富汗史》第二卷，张家麟译，潘庆龄校，商务印书馆，1972，第898—899页。

弱无力，而且阿富汗老百姓也不接受人民民主党的改革。他只能通过使用强制手段推行自己的治国方针，同时还极力使苏联军队去履行围剿讨伐职能，^①而接替卡尔迈勒的纳吉布拉也难堪大任，^②由此苏联深陷阿富汗“陷阱”近十年之久。美国则不仅以它自己设想的“自由民主”标准去选择在阿富汗的扶持对象，又试图以这个标准去改造阿富汗国内的政治秩序和政治系统，同时，还根据这个标准去妖魔化塔利班，长期把塔利班排除在阿富汗政治系统之外。而它挑选出来的阿富汗领导势力不仅贪腐严重，而且执政能力软弱，无力领导阿富汗政治经济秩序的重建。由此美国深陷阿富汗“陷阱”近二十年之久。

“帝国”能否尽快从阿富汗“陷阱”中出来，与它能否在阿富汗内部找到一个稳健而有力的领导人或组织有较大的关系，这个人或组织不是被“帝国”建构和扶植出来的，而是自主地产生和崛起于阿富汗原有的政治系统与政治秩序中。他/它与“帝国”更多的是一种合作关系，双方在有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相互协商和妥协，“帝国”要接受它既不可能好处尽占，也很难实现其全部的战略诉求和目标的现实，而“帝国”如果没有坚定的战略定力和必要的战略胸怀，它将很难做到这一点。

四、阿富汗的大国政治效应与中国的政策应对

中国在推进周边外交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不可能不面对和应对阿富汗这样一个特殊而重要的邻国。一方面，中国不应无故囿于阿富汗是“帝国坟墓”的偏见，而对于阿富汗问题无所作为；另一方面，尽管中国不谋求扩张和霸权，但中国在参与阿富汗重建的过程中，仍需要对阿富汗“帝国陷阱”效应有充分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推行正确的对阿富汗政策。^③

中国应明确阿富汗对中国的实际价值与中国对阿富汗的实际需求。阿富汗

① A. 利亚霍夫斯基：《阿富汗战争的悲剧》，第196—201页。

② A. 利亚霍夫斯基：《阿富汗战争的悲剧》，第284—285页。

③ 关于国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可参见赵华胜：《中国与阿富汗——中国的利益、立场与观点》，《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5期，第3—19页；富育红：《对中国进一步介入阿富汗问题的思考》，《国际关系研究》2014年第5期，第81—92页；刘中民、范鹏：《中国对阿富汗重建的外交参与》，《亚非纵横》2015年第1期，第11—24页；朱永彪、武兵科：《美国撤军后的中国对阿富汗政策：动因、挑战与前景》，《南亚研究》2016年第1期，第75—90页；肖河：《从“发展外交”到深度介入：“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对阿富汗政策》，《南亚研究季刊》2016年第2期，第25—32页；李青燕：《阿富汗形势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南亚研究季刊》2016年第3期，第9—16页。

对于中国的价值主要在安全方面，最重要的是传统安全方面的价值，其次是非传统安全方面的价值。阿富汗对中国的传统安全价值主要是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友好协调。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保持友好协调，将会大幅改善巴基斯坦的外部安全形势，巴基斯坦外部安全形势的改善有助于改善南亚大国力量对比的失衡，从而制约印度推行激进冒险的对华政策，减轻中国西部边疆的安全压力。阿富汗对中国的非传统安全价值主要是阿富汗不允许“东伊运”等“东突”暴恐分子通过阿富汗的领土危害中国新疆的安全稳定。

当前，阿富汗的重建过程仍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甚至有可能影响中国的安全稳定，但阿富汗问题终究只有阿富汗人才能解决，中国应支持阿富汗人民自主决定国家命运，对于阿富汗重建，中国应发挥建设性和协调性作用。从阿富汗对中国的实际价值和对中国对阿富汗的实际需求出发，中国对于阿富汗重建应以外交协调为主，有限的经济参与为辅，避免直接安全介入。就外交协调而言，一方面，中国可从双边和多边层面推进阿富汗重建的国际协调，借助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会议和阿富汗邻国协调合作机制等形成外部共识与合力，为阿富汗重建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防止外部大国在阿富汗过度竞争。另一方面，中国可加强与阿富汗政府在治国理政上的经验交流，适当地为阿富汗政府提供对外政策方面的有益建议和人才培养，帮助阿富汗避免因对外战略决策失误而再次引发大规模动荡。就有限的经济参与而言，目前中国对于阿富汗重建更多地应着眼于人道主义援助，多解燃眉之急，多做雪中送炭之事，力所能及地扩大对阿富汗的市场开放，对于农业、工业、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进一步经济合作，先做好前期的调查研究和规划设计，再视阿富汗的政治和安全局势走向而确定是否落实。总之，尽管阿富汗“帝国陷阱”效应不会出现在中国参与阿富汗重建的过程中，但该效应对于任何国家的再次出现都会不利于中国的安全稳定和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对此，中国应有所关注，并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预防阿富汗“帝国陷阱”效应的再现。

On the Effect of “Empire Trap” in Afghanistan

DU Zheyuan

Abstract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history of Britai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entering Afghanistan by force in modern times, we can find that the concept of “empire trap” can more accurately and objectively reflect the most prominent effect of Afghanistan in great power politics than the “empire grave”.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empire trap” effect in Afghanistan often goes through these three stages: attracting “empire” into, increasing “empire” loss and forcing “empire” evacuation. And these three stages have fiv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rocess of China advancing neighborhood diplomacy and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in neighbouring regions, it is impossible for China not to face and deal with such a special and important neighbor as Afghanistan.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actual value of Afghanistan to China and China’s actual demand for Afghanistan, China should mainly take diplomatic coordination in the Afghanistan issue, supplemented by limited economic participation, and avoid direct security intervention.

Keywords Afghanistan Issue; Politics of Great Power; “Empire Grave”; “Empire Trap”; Neighborhood Diplomacy of China

Author Du Zheyu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Doctor of Judicial Science.